

“垃圾处理厂”可以不是一个敏感词

曹林

值中韩新闻界建立交流关系20周年之际，应韩国记协的邀请，9月17日至22日，中国记协组派中国新闻代表团一行11人赴韩国参加了“韩、中、越三国记者论坛”。我作为代表团一员，此行感触颇深——尤其是对首尔麻浦资源回收中心的访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资源回收中心”其实就是“垃圾处理厂”，在中国，“垃圾处理”是一个敏感词，公众闻“垃圾处理厂”色变，有着深深的恐惧，已经因选址问题引发过不少群体性事件。而麻浦资源回收中心却能与周边的居民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让同样对“垃圾处理厂”充满恐惧想象的我们很是惊讶。

我也拜访过国内的一些垃圾处理厂，介绍中听到的都是诸如“国际先进水平”、“世界领先”、“全球顶尖”之类的炫目字眼。相比中国很多城市的垃圾处理设施，麻浦资源回收中心并不是最先进的，其最先进之处在于那套坦诚、友好、开放地面

向公众的透明机制。

人天然会对垃圾有厌恶心理，尤其当与一个庞大的垃圾处理厂为邻的时候，厌恶、恐惧和排斥自然更强烈。可现代化大都市生产着越来越多的垃圾，城市不能离开垃圾处理设施，也无法建在一个远离人群的地方。城市人无法回避地要与垃圾处理厂为邻。麻浦资源回收中心通过各种途径让周围的居民相信，处理厂不仅不会损害居民的利益，不会破坏环境和伤害公众的健康，还会成为一个给居民带来很多便利的好邻居。

民众最恐惧的，自然是垃圾焚烧后从烟囱里排出的废气。麻浦企业在显眼的位置设立了垃圾处理的模拟装置，旁边有电子显示屏，实时显示烟囱里所排废气的各种数据信息，对比着国际规定的标准。我们参观的时候看到，好几项有害物质的含量都为零，其他也都远远低于国际限定的标准。当然，这些数据都很专业，多数居民都看不懂，但数据是公开的，居民看不懂，媒体、专家、监管者能看得懂，问题信息会迅速被监控到。这种透明与开放的

信息系统，让居民能够放心地与麻浦为邻。

当然，透明和开放远不止实时和滚动的数据，更有一套透明访问系统和公共教育系统使公众向来充满恐惧想象的“垃圾处理”完全祛魅了。“垃圾处理厂”向来是一个封闭和神秘的场所，人们对垃圾处理的恐惧，一方面来自对垃圾的天然厌恶，一方面就源于神秘——因为神秘，公众只能通过自己种种想象的碎片去构建对垃圾处理过程的理解：肮脏、混乱、臭气熏天、污水遍地、苍蝇乱飞——这样的想象中，谁会愿意自己身边有这样一个邻居？

而麻浦整个垃圾处理的过程完全是对市民开放的，每个人都可以走进企业，看到整个垃圾处理的过程。“市民自由地参观”不是为作秀用的，而是这套垃圾处理设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就给市民的参观留下了位置，使市民成为监管的主体。垃圾处理的流程虽然封闭起来了，却透明可见。设计的时候专门留下了参观的长廊，公众透过玻璃可以清

楚地看到垃圾从分类、焚烧到发电的整个流程，清晰直观地看到垃圾变成电、铺路砖。在这个流程中，没有肮脏、混乱和臭气熏天，只有秩序、科技和以人为本的关怀。

在神秘、封闭和不确定中，人才会有恐惧；而麻浦所做的，就是穷尽所有的努力去消除垃圾处理厂的神秘和封闭，将一切置于公众的眼皮下。垃圾处理厂不是洪水猛兽，不是脏乱差的集中营，不会对居民造成危害，这些不是官方告诉民众的，而是在这个透明开放的流程下公众自己可以作出的判断。

麻浦资源回收中心还建了一个公共教育中心，教市民如何对垃圾进行分类。访问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好几拨老师带着孩子到这里参观，自小培养孩子垃圾分类的习惯和对垃圾处理的认知。在这个中心，我们还看到了孩子们用垃圾制作的各种工艺品，这应该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方式。这家中心还利用垃圾处理回收的能量为周围两千多户居民供电供暖，这不仅是一种资源回收，更是

一种对垃圾回收共同的利益感觉：不仅没有危害，还能给居民提供很多实实在在的便利。

前段时间访问著名的环保问题专家、中央编译局的曹荣湘教授，曹教授谈到了一个很严峻的社会问题，当下中国由环境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可实际上，无论是PX项目，还是垃圾处理厂，并没有什么环境风险，却引发了不小的群体性事件。关键不在民众的“不明真相”，而在于政府的瞒和捂，缺乏信息公开的诚意和准备——只是单纯地说“没有风险和危险”，却没有以看得见的方式让公众自己作出判断，人为地将PX项目和垃圾处理变成了敏感词。实际上，在这种封闭专断的治理生态下，不仅环境问题，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点燃民众的某种情绪酿成事件，处处都是不可触碰的敏感词。

一个意味深长的现实是，从麻浦资源回收中心的长廊所展示的照片看，中国很多地方官员都参观过这个中心，可惜的是，取经学到的最多只是技术，却对这套最先进的透明开放系统熟视无睹。

检察官最需要何种“读脸术”

杨涛

人有平静、悲伤、厌恶、恐惧、喜悦等7种状态，首先要设定情绪基准线，以得到真实的反应。司法实践中无法设定全部情绪的基准线，但审讯前，可以通过先聊一些有关孩子、工作等与案情无关的话题，取得被审讯人的真实反应，设立平静、厌恶、恐惧等基准线。进而，检察官就可以通过嫌疑人在审讯中表现出违背真实反应的微反应，推断其是否说谎，这就是俗称的“读脸术”。据了解，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已有检察官凭借“读脸术”，成功破案。（《北京日报》9月25日）

“读脸术”对于侦破案件确有明显的效果，这从昌平检察院已经侦破的案件可见一斑。而且，我还相信，如果检察人员能精心于研究“读脸术”，提高识别贪官说谎的能力，对于遏制刑讯逼供也是一件好事，可以减少检察官逼取口供的比率。不过，现实残酷的是，对于检察官而言，恐怕他们更多的练习的不是识别贪官说谎的“读脸术”，而是识别上司情绪变化和意图的“读脸术”。

此话怎讲？以安徽阜阳市检察院原检察长汪成报复陷害案为例。当区委书记张治安要求汪成对举报人李国福打击报复时，汪成就压制下属检察官对李国福立案侦查，并明示批捕的检察官，李

国福案系张治安交办，必须逮捕。李国福案到了审查起诉阶段，汪成又向公诉部门施压，仓促结案。在这里，汪成的“读脸术”，就是读出区委书记张治安的脸部变化，明白张的喜悦哀乐、张的意图，而作为批捕和公诉的检察官的“读脸术”，则是要读出汪成的喜怒哀乐、汪的意图。

这种另类的“读脸术”比所谓的对贪官的“读脸术”重要的多了。因为，不懂对贪官的“读脸术”，顶多就是侦查期间延长或者侦破不了一个案件，但是，如果不懂对上司的“读脸术”，情况就会严重得多，检察长或者检察官轻则被“穿小鞋”、不能升迁，重则丢官或者牢狱之灾。因为，地方司法机关的人财物都被控制在地方党政手中，检察长不能不听从地方党政官员对案件的干涉；而检察官相对于检察长的独立性也弱，检察长也可以轻易地对检察官调动岗位、撤职。

只有真正地摒弃对上司的“读脸术”，让检察官不用看上司的脸色行事，对于反腐败斗争才具有战略上的意义。到那时，检察官对于腐败分子能查、敢查，他们对贪官的“读脸术”就有用武之地。这就需要我們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改革地方司法机关人财物受控的局面，让“除了法律没有上司”的司法人员能真正成为“法律帝国的王侯”！

“比基尼京剧”不是创新是亵渎

何勇海

近日，一组国际比基尼小姐身着性感比基尼、戴着京剧头饰、进行含有京剧元素的比基尼秀的照片，在网上被广泛转发。有网友称其糟蹋国粹，也有人认为是创新。国际比基尼小姐大赛组委会有关人士回应称，此举旨在向世界传递东方美感，绝没糟蹋国粹京剧的想法。（《成都晚报》9月25日）

京剧头饰很美，比基尼很诱人，姑且将这种“混搭”了比基尼的京剧，称作“比基尼京剧”。从网络留言来看，绝大多数网友的批评是猛烈而辛辣的，批其哗众取宠者有之，批其挑逗观众感官者亦有之，有人认为“这是对传统艺术最失败的传承和创新，国粹被糟蹋得令人无法接受”，有人甚至直言“性感外露的比基尼与含蓄内敛的戏曲是水火不容的，而‘比基尼京剧’只有三围，没有内容，该何弘扬国粹”。

在笔者看来，国际比基尼小姐大赛组委会面临如此责难，完全是咎由自取。

应该承认，包括京剧在内的一些传统艺术如今日渐式微，确实需要创新，使之枯木逢春。但如何创新却是个严肃命题，再怎么创新，都应以保护和传承为主旨，以尊重传统艺术为前提，都不能丢掉“传统”二字，而将其扭曲或恶搞面目全非。

具体而言，京剧与比基尼，完全代表着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中西文化，好

比一个是古代大家闺秀，一个是现代“三点式”女郎。京剧之美，美在极富表现力的唱功和婉约的内涵，美在那种古典的优雅、典雅的矜持、文化的深邃；而比基尼，如果说它也很美，也只是美在女性半遮半露、性感妖艳的曼妙身型。可比基尼肤浅低俗的外在美，怎可与京剧的古典美、文化美、思想美相提并论？甚至可以说，二者相互冲突。

当京剧“混搭”了比基尼，这样的创新就颇有些不伦不类。中西文化可以交流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也可以相互渗透，但不可生搬硬套，更不可恶搞。否则，性感妖艳的比基尼与流传千年的国粹，不仅碰撞不出时尚的火花，反而会让人觉得，此举不过是借助京剧的“文化外衣”来达到“另类诱惑”，颇有卖弄风骚、让京剧成为“情色闹剧”之嫌。从这个角度说，就有点糟蹋国粹的味道了。试问，这场国际比基尼小姐比赛中的那些中外模特，又有几人懂得京剧的真谛？

说穿了，某些人之所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让艳光四射的比基尼女郎演绎国粹京剧，其醉翁之意，并不在于弘扬中华文化，而是借京剧外壳赚取眼球，达到不同凡响的商业炒作效果，以获得较大的经济利益。对这类为了赤裸裸的经济利益，而不尊重甚至是糟蹋传统文化的赛事，有关部门应该责令其整顿并处罚，至少应向传统艺术的坚定捍卫者道歉，以使其对传统文化多一些敬意和爱护。

虽然“贪大求洋”不对，但在农村医疗水平有限的境况下，患者挤向大医院也实属无奈，值得同情。如果因为“九成病人不出县”的硬性指标，而导致有些病情被耽误，那则是对生命的犯罪。在这一意义上，不宜强求“九成病人不出县”。

相对于这个针对病人的指标，卫生部其实更应提出一个针对医院的指标。具体地说，就是研究制定出一个县级医院水平应该具有的基准线，逐一核定诊疗各个县的医疗水平，然后提出明确的医疗改进方案。特别是针对县级医院，要有一个明确的评判标准，作出一个明确的水平评判，并且提出明确的改进计划。然后对着计划行事，提出时间表，列为政绩考核，明确要求地方财政加大医疗投入，确保医疗水平达标升级。

爱社区：家与国之间的缺失项

程曼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放在传统中国很完满，但用到现代却少了一环：那便是“家”与“国”之间的“社区”。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是西方的“团体主义”；用现在知识分子的提法则是“公民社会”。在最近的群情激昂中，有些人又何以会以“爱国”为名做出种种冲动之举？这些问题都和缺失的一环——“社区”有关。

社会说起来比较抽象。对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社会最简单的对应是我们生活的“社区”。这个社区是地理意义的，比如我们生活的公寓或者大院；也是情感和认同意义的：个人将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认同为社区的一员，对社区有归属感，在此基础上愿意为社区的发展做出努力。社区的范围可小可大。小可以是一栋单元楼，邻里便是社区成员；大可以是一个小区，乃至一座城市。

笔者今年夏天在旧金山体会了一回美国人的“爱社区”。在旧金山电报山游览时，当地一个非营利导游组织“城市导游”（City Guides）为我们提供了免费服务。在游览过程中，导游本身成为最亮的风景。这位退休的老者，很认真地准备了一个小册子，展示电报山的名人、建筑和历史故事。除了一般导览会提到的名胜，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导游对一栋不起眼的老房子、一棵树和一个消防栓的自豪之情。这所老房子曾是一位退休好莱坞女特技演员的住所，正因为她自发的辛勤劳作，曾经垃圾成堆的山坡变成了风景宜人的花园，当地的房产价值也随之提高。这位在正统文献中并不出名的人物在当地家喻户晓。这片社区还有棵树，长到了道中。当初在修路时，原计划要砍掉这棵树，但居民经过努力，使路在这里拐了个弯。不远处还有一个不起眼的消防栓。导游特别停下来让我们注意消防栓曾经移动过——这是为当地社区的轮椅使用者而特别做出的修改。

在这位志愿者的讲解中，电报山的每一栋房子、小店、转角都鲜活起来。他个人对电报山的热情，对这里的生活的熟悉和热爱感染了外来的者。所谓软实力，并不仅仅是好莱坞大片的票房，还有社区居民满足的笑容。对身边环境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传递社区价值的愿望难道不正是我们所缺失的吗？

这种缺失首先来自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的“流动性”及长期以来形成的“户籍制度”之间的张力。我们很难像这位老者一样一辈子生活在一个地方。从乡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我们总在寻找更好的机会。不管是外出的农民工还是追求学业和事业的年轻人，都是背井离乡者，我们需要重新融入新环境，让我们的家庭和后代在此扎根，我们需要在异地建立故土。但中国之大和城乡之间地域情感和政策上的隔阂，又常使在外奔波者产生一种“不安定”感。“融入”因此变得困难重重。

这种缺失还和中国传统到现代的变迁有关。在传统中国，身、家、国以至天下的链条之间可以完整，是因为家是“家族”，“国”在一定程度上与家族有同构性（在春秋战国及之前）。身、家、国、天下是一个可以以过渡进阶的过程。而在西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身、家、国、天下”本来的完整性已支离破碎。原本并没有清晰“公私之分”的伸缩的“自我观”也被“个人主义”改造。但与“个人主义”配套的“团体主义”或者说“公民社会”却没有得到发扬。破是破了，立还没有立。这就使个人和更大的国家之间少了联系和沟通，民众缺乏对国家的认同感。于是有了普通人对“国民教育”的反弹；于是出现了打着“爱国”旗帜，却不知道怎么真正爱国的盲目热情。这对民众和政府来说都不是件好事。

连接个人、家庭和国家的必要的，但号召爱国何必时时打“国民”之名？总提作为整体的国家，并不是增加凝聚力的唯一方法，更不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切实手段。解决社会空间的缺失，唤起每个人对所在社区的关心，是政府和民众需要合作努力的事业；关心社区并同时教我们的孩子关心社区；更重要的是努力创造一个环境：人人可以理性地、同时也是温情地关心社区和社区中的他人。



校园来信

儿童读物中的三聚氰胺

汪强

上周六，无锡的高先生在当地新华书店为女儿买了一本售价22元的《新编德育三字歌》，结果发现薄薄92页的书，几十处拼音错误。记者就在书的封面左侧发现了“长(cháng)到大”的错误拼音。（《扬子晚报》9月25日）

作为一名教师，深知这种读物对儿童的戕害。儿童对一个字根本不会读，老师教他一两篇，他也许就会了。但假如有人已经教了他，教错了，且错误的读音与正确的读音比较接近，要纠正就得花不少工夫了。有时说不定纠正了十几遍几十遍，一不注意又回到错误的读音。一本书上出现了几十处拼音错误的字，就等于教了儿童几十个错误读音，对儿童带来多大的危害？

相比之下，儿童读物中出现读音错误及其他知识性错误，还不如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直接毒害儿童稚嫩的心灵。有的充满了恐怖暴力，有的粗俗不堪，有的散发着腐朽的气息。曾经有一本儿童读物，充斥着这样的回答：“小毛和阿兰认识才两天，为什么就知道她是喝羊奶长大的？答：因为她太骚了。”和“小明爸爸经常在一起的女人不是小明的妈妈，是谁？答：是小明爸爸的小蜜”；“为什么白天母鸡嫁给了癞蛤蟆？答：因为癞蛤蟆有了钱”。

家长给孩子买儿童读物，本是带来乐趣、增添营养的，可买到的竟是如此低劣的读物，不等于给孩子买了含三聚氰胺的奶粉吗？这就难怪有家长屡屡为低劣的读物向媒体及相关部门投诉。一名“70后”妈妈就曾经向媒体投诉，认为儿童成语读物中收录“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太八卦，完全不适合儿童阅读。

这个问题，不妨先看看《新编德育三字歌》一书责任编辑的答记者问：“所有的拼音都是电脑软件自动标注的，为了赶上

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有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那么，如果真的打起官司，对“送家具”的理解是会按照消费者的理解执行的，不排除真的送家具的可能性。

律师指出，“买房子，送老婆”的广告用语不规范，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规定。不过，我们更理解的是开发商促销的迫切心态，“我们打这个广告就是为了国庆促销的。”为了吸引眼球，于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才用词语的“歧义”吸引公众。开发商这种做法，何尝不是房地产的不景气逼出来的无奈之举。

可惜的是，“买房子，送老婆”的广告也唤不来“金九银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近期督查情况看，房价尚不具备全面反弹的条件，“金九银十”风光不再，“送老婆”之类的噱头不过供人一笑而已。

不必强求“九成病人不出县”

毛建国

卫生部发布通知，要求深化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工作，进一步提高县级医院医疗服务能力，争取实现90%的病人看病就医不出县域等目标。（《京华时报》9月25日）

现在医疗卫生领域，确实存在百姓看病“贪大求洋”：大医院扎堆求医，小医院门可罗雀。这种现象不仅极大地浪费了医疗资源，而且加剧了“看病难、看病贵”，增加了看病负担。然而，这种现象，

单指指责患者是没有意义的。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医疗资源配置极度不平衡，优质资源几乎都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而农村，从村卫生室到县医院，医疗水平长期严重滞后于大医院，落后于百姓的实际需求。那种源于小医院技不如人，出于对生命的敬畏，而背负经济和精神双重压力而转投大医院的百姓的无助，值得理解和同情。

卫生部要求“九成病人不出县”，积极的理解，应该是希望促进基层医疗水平的提高，改变当前医疗失衡的局面。根据

卫生部的要求，三级医院要与县级医院建立更紧密联系，支援医院帮助受援医院研究制订发展规划，实行管理人员双向挂职，积极开展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探索建立支援医院和受援医院合作共贏的机制。为全面提高县级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卫生部还要求加强对县级医院重点专科的扶持力度。这对改善和提升基层医疗水平，对于缓解“看病难、看病贵”，可以起到“固本培元”之效。

但要看到，权力行事常常无视规律，不按常理，只求简单直接，不求治本长